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7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J.P.

黃宜弘議員， G.B.S.

黃容根議員， J.P.

曾鈺成議員， G.B.S., J.P.

楊孝華議員， S.B.S., J.P.

楊森議員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 G.B.S., J.P.

蔡素玉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 G.B.S.,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李鳳英議員，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 M.H., J.P.

李國麟議員， J.P.

林偉強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鄭經翰議員

鄭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缺席議員：

劉慧卿議員，J.P.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力議員，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J.P.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先生，G.B.S., J.P.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J.P.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會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今天，我會向各位講述有關特首述職的情況。

這次述職中，相信大家均記得溫家寶總理的勸勉，囑咐我們要“頭腦清醒”。

雖然香港去年的經濟表現的而且確令人驚喜，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全年估計可能超過 6.5%，但令我最開心的，還是失業率較我的民望跌得更快，創下 4.4%新低的紀錄。

我一直以來都是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態做好特首這份工作，我與同事先後多次提到“香港邊緣化”這問題，便是出於我們應該居安思危，不應該因為短期好景的消息，而忘記長期的憂患。

我認為今後數年是香港發展的最關鍵時刻，究竟香港能否在國家崛起中取得不可替代的角色？可否與香港的長治久安、繼續繁榮這關鍵的事情做出新的動作呢？

世界經濟已進入了全球化競爭的時代，香港不單與區內城市競爭金融、航運、物流、旅遊中心的地位，同時也與其他國際城市競爭，不單是要拼硬件，例如港口、機場，也要拼軟件，如人才、都市生活的吸引力、環境人文生活的質素。全球化競爭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根本沒有機會容下二流的城市。過往濫竽充數，利用資訊不流通充當中間人的時代已經過去。

在這次述職，我爭取國家支持確認香港作為國家的金融中心，地區的金融中心，然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地位，逐步將這願景變成真實。在北京期間，我先後拜訪多位負責財經金融的部委官員，商討有關的政策，包括拓展香港人民幣業務，爭取更多有質素的企業以香港作為投資及集資的平台。

在基建方面，我會全力推動港珠澳大橋盡快動工，維持香港作為區域物流中心的優勢。在空運方面，我希望解決航空空域擠塞的問題，增加香港新機場的吞吐量。

此外，為了鞏固香港作為內地市場與國際企業之間商業資訊中心的地位，我大力推動會議展覽業務，以吸引商務旅遊。對於這些工作，中央已作出即時、積極、正面的回應。

在軟件方面，香港要成為一流的國際城市，能提供健康優質兼具人文文化的生活，是匯聚人才的不二法門。環境污染與食物安全關乎健康，同樣需要與內地協作，這次述職中，我與有關官員商討更有效監管食物安全的機制，這方面取得了實質進展。同時，我們會致力與廣東省合作，逐步解決空氣污染問題。

近期備受市民關注的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目前已着手解決，昨天在這會場亦已經有充分辯論。我可以保證香港孕婦的利益是我們首要保障的，要人的話，我們一定有人；要醫院，我們有醫院；要錢，我們付錢，所以市民不用擔心。

最近，不論傳媒或議員皆關心我何時參選，甚至想我提早宣布參選。就着這個問題，我想說幾句話。我想向各位議員分享我的想法——一個從政者有責任的想法。

首先，我作為現任行政長官，責任重大，要與市民協力維持經濟繁榮，令香港市民安居樂業，活得快樂，在這方面是不容有失的。因此，我認為個人競選工作對日常管治的影響應減至最低。

第二，面對香港每天發生的事物和挑戰，每一天每一時均激發起我們很多幻想和願景，以期解決這些問題。不過，我清楚知道作為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候選人，如果公開推介未成熟的思維，並不是負責任的做法。作為負責任的候選人，須有充分的準備。我相信在座各位議員就公開提出未來理想願景的能力，遠遠比我優勝得多。但是，要讓願景變成真實，則是另一回事，當中要講求規劃力、協調力、執行力，並要反覆檢討，反覆修訂，反覆諮詢。我希望自己所提出的未來 5 年施政綱領不是只談願景，不講執行，或只談開支，不理會收入，又或只講理想，不顧現實。我會堅持當我起頭出任特首時的一貫原則，便是要講得出，做得到。

所以，直至這一刻，我仍然以行政長官的責任為先，同時也正為做一個負責任的候選人作出準備。在適當時候，我會向各位和香港市民詳細公開交代參選的決定。

多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提問。如有需要，議員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可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劉千石議員：主席，我相信行政長官也會同意，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過去數年，經濟是有可觀增長，但很多市民仍未能分享成果。失業率是下跌了，但低收入工人的工資亦仍在下跌。中央和特區政府提出了多項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例如昨天所公布的擴大人民幣業務措施，但大多數市民仍未能即時受惠。香港的情況便好像是一條行車線暢通無阻般，行駛於其上還可以越走越快，但其他數條行車線的車輛卻不能動，甚至往後退。如果這個不平衡的發展繼續惡化，香港一定會不妥當的。

主席，行政長官可否告訴我們，有甚麼新思維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呢？有沒有新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呢？有沒有新的財政和稅收政策，例如向收取了豐厚股息的大財團徵收股息稅呢？我一向是既考慮開支又考慮收入的。這樣，賺大錢的財團便可以多盡一些社會責任，而政府亦可有多些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了。這樣，社會才會真正和諧。

行政長官：香港近年的經濟表現的確令人感到興奮。不論是本地生產總值、就業人數或低通脹率，平均或客觀地看，在近 20 年來，每方面也是好的。不過，很可惜，這些也是宏觀的數字，往往說不出……正如劉千石議員所說，在個別情況下，很多基層市民仍未能享受到這次經濟復甦所帶來的繁榮，也感覺不到自己每月的薪金有所增加。

可是，整體而言，我們現時的情況的確較以往好。劉議員，我相信你所說的工資繼續下跌情況已經停止，即使有這種情況，將來也會很少的了。根據我們的資料，去年第三季跟 10 年前的第三季相比，月入 15,000 元或以上全職人口的比例，即中產以上的人數，佔我們全部勞動人口的數字，在 1996 年是 25%，現在則增至 34%。與此同時，月薪 9,000 元或以下，即較基層的市民人數，在 1996 年佔了我們勞動人口的 42%，現在則等於勞動人口的 36%。換句話說，比例也縮小了。其中最慘、最基層的市民，即月薪 5,000 元或以下的人，佔勞動人口的 5%。所以，從宏觀數字來看，情況是有好轉，不過，這並非表示沒有窮人出現，仍是有的。如果我們要找出解決方法，最好便是從就業和經濟方面着手。要保持工人本身的尊嚴，不是靠政府的綜援或以其他方法資助，以作為改善生活的最主要元素。在這方面，我們所做的，連同我今次到北京述職所盡的一切努力，也是希望能令香港各行各業增加本身的經濟活力，創造新的職位，以及使職位更好。

對於保障勞工方面，大家已經在這會場內辯論多次，而我在施政報告亦談過應採取甚麼方法來保障工人的薪金不再下跌。我們現正推行一項大運動保障最低工資，我很希望這個運動可以取得成效。我們一定會在兩年後提出報告，而 1 年後，我們亦會進行中期檢討，我們有決心進行此事。如果這件事不能取得成效，我們便會立法保障工人的利益。

至於其他舉措，特別是稅務上的舉措，我希望劉議員跟其他議員一樣，趁着財政司司長現正為準備製作下一年度的預算案而進行諮詢時，盡量向他提供意見。我們亦很想把稅基擴闊。大家也知道，就銷售稅方面，我們現時已停止辯論，我們一定要尋求其他方法來擴大我們的稅基。我們也想張開耳朵來聆聽很多事情。

劉千石議員：特首好像沒有回答我關於有甚麼措施可縮窄貧富懸殊？我想知道具體的措施。

行政長官：有關具體的措施，我們在很多場合已說過了，不是在這裏具體說明，而我在施政報告也提及了一些，下一個財政年度也會說。我相信這些問題並非一朝一夕、憑一個舉措或兩個舉措便可以解決。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從就業着手，這是最重要的。當然，有些特別的措施，例如你們已在積極討論的交通津貼，以協助居住於特別偏遠地區的市民就業，我們以往已在不停討論，而且亦會繼續做，特別是對於居住在偏遠地方的居民，我們如何在就業方面協助他們？如何做得更好呢？我希望能在幫助他們的服務方面加強一些。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下工夫的。

可是，劉議員，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創業，一定要創造職位，這便可以令經濟活力更暢順。在這種情況下，當社會的經濟活力變得強勁、職位增多，便會有足夠競爭能力，薪金自然會提升。況且，現時經濟復甦，已帶動了薪金向上調，最低限度，薪金已停止下跌，這是事實。

李國寶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問特首，現時股票市場那麼好，利率那麼低，會對香港今年的經濟有何反映呢？

行政長官：香港的股票市場和經濟皆好，我相信大家都會很開心——議員也很開心，我看見他們正在笑。我想這件事反映出市道的數個現象：第一，內地資金認為這裏是理想的投資市場，所以陸續到香港來上市，特別是以前曾成功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具規模企業。在數家企業成功上市後，隨着我們現

時這種經濟基調，其他的會陸續來港上市。我想股票市場暢旺，是會維持一段時間的。

此外，香港的經濟方面，還有其他可以看到的現象，例如美國息口似乎已上升到頂；本地就業情況好像陸續有所改善；家庭收入逐步上升。我很相信從剛才李議員所說的形勢來說，我們短期和中期的經濟展望亦相當樂觀。可是，我們知道一定要防範股票市場會出現反覆的情況。恒生指數可以上升得很快，又可以下跌得相當快，外圍亦有很多波動情況。最近，泰國的泰銖波動，我相信李議員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知道這件事會影響整個地區金融體制的穩定性。因此，我很相信，投資者本身要特別小心瞭解自己在投資方面能否承擔這些風險。

從金融管理方面來說，政府一定要搞好市場管理的風險，必須做得更好，因為市場擴大了，即池擴大了，我們的管理能力一定要像其他市場，例如倫敦一樣，能勝任這份工作，以令香港的市場得以更有秩序地運作。從市場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一定要利用這個好玄機，推展香港至一個真真正正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相信這是一個大契機。

梁劉柔芬議員：*曾先生，你剛才說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我從報道聽聞，國家對這項意見亦很支持。可否請你告訴我們，香港作為國家的金融中心，對我們未來的整體發展有多重要呢？還有一點便是，內地城市，例如上海、深圳等，對於金融市場的發展，它們均在推動長足發展，亦取得了很大成果。我想請問，我們如何避免惡性競爭，或如何能甚至從互補長短的角度來發展呢？請曾先生說一說。*

行政長官：金融中心，特別是國際金融中心，世界上不能有太多，因為實際上，往往要有一個匯聚的情況，才能造就一個成功的金融中心。

我們環顧世界，在美洲，包括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中美洲，我們看到只有一個巨型的金融中心，那便是 **New York**。整個歐洲連同東歐在內，發展了那麼久，現時是同屬一個貨幣體制之中，我們看到他們也只有一個巨大的金融中心，那便是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似乎須有很多東西來扶持，不單是它本身的基建，還要加上當地的法律、傳統，以及人才匯聚等各方面，特別是當地能否匯聚財經金融的專才。此外，他們本身的管制和自由幅度亦有所影響。

我們覺得，環顧亞洲這個時區，如果問：哪個地方有最好的基建，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呢？我便覺得香港是有基本條件的。此外，這一兩年的趨勢，更形成及公認了香港是真正有機會成為可以跟 New York 和倫敦媲美的地方。這些金融中心如果真的建立了地位，便會帶動其他服務行業的發展及投資的機會，令它們提供足夠就業機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New York 的失業率不會很高，倫敦的亦不會很高。它們的行業只有一種，便是國際金融、財務的事務，並且會帶動貿易和航運等。它們的構成，跟香港這數年的增長很相像。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朝着這個方向走，加上我們在科技方面的提升，在基建方面保持我們的競爭能力，我很相信，真的很明顯在亞洲時區內，當國家本身的金融力量、貿易力量能類同美洲和歐洲一般時，香港會佔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且一定可以跟 New York 和倫敦媲美。

對於其他城市爭奪的問題，我們要看看本身的基建，這不單是說有多少錢在這裏投資，更要看看為何別人要在這裏投資。為何別人要拿錢到你這裏投資呢？換句話說，他們是相信你這個地方，更相信本地的投資機會，這是須有很大的能量、很大的努力、很大的決心才行。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便要表明本身是否有法律上的基建，我們本身是否有自由的系統，政府是否可靠，市場是否穩定，監管能力是否足夠。在這方面，環顧國內，暫時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趕上香港。

所以，我這次到北京匯報時，溫總理便說得清清楚楚，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以取締的，原因便是如此。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我想自由黨很高興聽到這些，因為這是我們的一個大目標。曾先生剛才說人才方面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在我們的金融業發展中，有很多很多其實是“海歸”的，我們如何保持我們自己的人才在金融服務業也有競爭能力、佔有一席位？我想就教育及各方面的配合提出跟進問題。*

行政長官：這是必要的。我們要爭奪的並非單純是金錢和投資，我們還需要人才。在這方面，香港有一項頗寬鬆的入境政策。全世界各地的人才如果想在香港生根、在香港就業、在香港生活，我們一直也是歡迎的。

現時，香港的財經界融匯了全世界各類人，例如來自日本、美國、歐洲的人都在這裏做生意，也有很多內地人在這裏做生意，原因是我們有一個較寬鬆的入境制度。況且，我們整個社會都是循這方面發展及作出配套的。不論是國際學校，還是我們現在談論的人民生活、多元化文化，以及空氣質素等，皆是圍繞着一個很重要的目標，便是一方面要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生活質

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吸引外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要求有高質素生活的財經界專業人士在香港落葉生根。

單仲偕議員：曾特首，你在剛過去的一次上京述職時，曾表示依你看來，現時是最近 20 年來最好的情況。相信不少市民均認同，你出任特首，當然是你過去那 20 年來是最好的，你由庫務司任至財政司，再由政務司司長任至特首。可是，根據民主黨進行的調查發現，在八百多名受訪市民中，有七成表示與 10 年前比較，現時的經濟狀況和生活質素均沒有改善，更有三成四的市民覺得生活質素較 10 年前差了。我想問特首，你的判斷跟市民的有如此大的落差，原因在哪裏呢？這會否影響政府制訂的政策呢？

行政長官：我想正如我剛才回答劉千石議員時所說，任何數字的背後均隱藏着許多的血淚史。現時雖有很多基層市民仍未能分享到這些，但這是政府的希望，也是各位議員共同努力的目標。

不過，從宏觀的數字來看，我自己進行的一些研究顯示情況確是如此。當然，我的研究可能跟民主黨的研究有所區別，我們所用的樣本亦可能不同，所以便得出不同的結果。我所用的是反映香港整體的數字，我是從數方面來看的。第一，是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本港最近連續 3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也在 7.5% 以上，反觀我們以往的 20 年，沒有一年能達到這個水平。在 1991、1993 年時，有差不多 3 年時間是持續穩健上升的，但升幅也只是 6.3%。我覺得從這第一個方面來看，已顯示現時是 20 年來最好的了。

第二，是通脹方面。在這 3 年來，本港的通脹率維持在 2% 以下的低通脹水平，跟以前高速增長時期的 7%、8%、9% 的情況十分不同。收入方面變得較為穩定，市民的購買能力亦較強，這方面可以看到也是好的。

第三，是經濟結構方面。我們現時的經濟結構已包括金融業、貿易、物流等各方面，社會的結構已複雜化、多元化，得以應付外來突如其來、突發的意外，這些香港也能應付。我相信本港現時應付這些金融風暴的能力已較以前強很多。從數字上看，我們現時的總貿易額已相等於我們的 GDP 的三倍以上，10 年前也只有兩倍多而已，換言之，貿易額已大大增加了。這亦是一點。

此外，就我們本身的結構方面而言，在現時的工作人口中，專業人士約佔 40%；大專方面的比例也是 30%，以往的數字亦從沒有如此高。從這個結構方面來看，我們認為現時也差不多是 20 年來最好的時間。

在收入方面，我剛才也提及一些數字，便是在 10 年前，賺 15,000 元以上的人約佔總勞動人口的 20%、25%，現時卻是 34%，低收入的人的比率亦已下降。

從這些方面來看，我們真真正正看到現時是 20 年來最好的；20 年以來，我們這數年是最好的了。在本地生產總值方面，現時的人均生產總值約為 27,100 元，這數字也是歷史性高位。以往也曾達到 27,000 元，但我們發覺當時的通脹也特別高，減弱了市民的購買力。我們現時的購買力增強了，以 27,000 元來計算，在生活方面，我們的購買力較以往強，我們本身也強化了。

從以上的宏觀數字來看，我再說一次，在這些冷漠的數字中，我們是好了很多，我們應在配合方面繼續做工夫，特別是幫助我們的基層市民分享這些。

單仲偕議員：特首，我還有一個較冷漠的數字跟大家分享一下，以說明 10 年前跟現時的情況，那便是香港的堅尼系數在回歸前是 0.4，現時的堅尼系數是 0.525。簡單來說，這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在過去 10 年擴大了，而這亦可能會影響政府的施政。因為如果貧富懸殊擴大了，而香港整體的情況則好了，即表示差的可能會更差，好的當然可能會更好。問題是政府會否針對 — 這其實與劉千石的問題是如出一轍的 — 貧富懸殊差距擴大，在經濟復甦下，可能有相當大部分的基層市民在此階段仍未能分享或未能感受到成果而作出判斷。政府可以做到甚麼呢？

行政長官：我剛才也回答了劉千石議員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從經濟活力、增加就業機會着手，使市場具競爭力，使勞動市場更具競爭力，這是唯一可以保障勞動人口，特別是基層市民本身的薪金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至於其他方面，我相信提供補助、綜援等，並非有效的、長期可行的方法，亦有損他們工作上的尊嚴。因此，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上述各方面做工夫。

對於堅尼系數，我其實經常也很懷疑 — 有很多國家也懷疑，這個系數在城市經濟體系內是否適用。特別是就香港而言，這個全憑吸引有錢人來港，吸引財經界最有錢的人來港的地方，我們可否利用堅尼系數來反映普羅大眾的生活是否下降了？當然，差距是大了，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保障窮人不會繼續窮，今天貧窮的人明天不會窮，後天會生活得更好。我們要確保流動率高，我想我們的目標便是在這方面下工夫。

記得我們現時每天有 150 人從內地來港定居，他們很多也沒有帶很多的資源來港，可能來港後便立即加入為基層市民。換言之，我們永遠也有基層市民加入我們這個新元素內。我們應歡迎這些人到來，我們有這樣的資源，而我們又需要人，這便可增加生力軍。可是，在我們付出時，他們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冒升，有些人可能要等一代也說不定。不過，香港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地方，所以我們不能在基層的薪金方面做到很多，利用政府的方法、行政手段強行提升，但我很希望透過我們在就業市場方面繼續努力，他們的生活會繼續好、繼續好。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年要是差勁的，便希望明年會更好，後年更好，這便是我們工作的目標。

陳鑑林議員：特首，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航空領域問題一直困擾着本港的航空業界，令過去 3 年的航班延誤情況非常嚴重。

我們民建聯的政協委員去年曾聯署向全國政協提案，亦知道特首述職時也曾提及此問題，剛才亦提到希望就這問題增加香港機場的吞吐量。我們明白國務院總理也非常重視這件事，甚至委派廣東省和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共同研究此問題。我想知道特首今次述職回來，會否為我們帶來好消息呢？

行政長官：我上次向總理反映的，是政協以往曾在不同場合提出的此問題，但現在問題更為嚴重。香港的民航局、北京的國家民航總局和澳門的民航局已經不停為這件事努力，並早在兩三年前，即 2004 年成立了三方工作小組，協調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區內的空域，而且作出了數次調整，已令這方面有所改善。

可是，畢竟是有飽和點，最終也是要面對空管方面的飽和量的困難的。特別是航空業正在擴展，我們一定會需要更多的空域，讓民航航班可以使用這些新的空域。我是基於這背景向總理提出問題的。

總理對這件事有很正面的回應，他的回應是立刻將此事加入國務院的議事日程，換言之，此事會由國家最高層專題處理。我十分相信這決定一定會影響國家民航局和有關空管的單位，促使它們必須回應這要求而提出改善的方法。這情況不單牽涉珠江三角洲的發展，長江三角洲的情況也一樣，上海的航班也不停出現延誤點，北邊的情況也一樣。我相信這問題是有需要國家開放更多的空域供民航班次使用，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知道中央已經關注到這問題。

在特區方面，我一定會透過三方工作小組，盡量爭取多與內地互相配合，希望令所有空域得以擴大。我覺得現時最急於使用的空域是從香港到華

東的航線，這空域是最緊張的，一定要擴張到杭州、上海這條航線的空域，我會就這方面更努力。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想知道特首下一階段會否與有關地區政府、三方工作小組進一步落實解決這問題的時間表？因為香港與周邊地區的交通協調事實上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在這問題上仍然停滯不前，便可能會對我們的物流業、航空運輸業的地位造成影響。

行政長官：我們已經優先處理這件事，而總理亦已將問題放入議程內，我相信處理速度不會慢。可是，時間表並不應由我們訂定，空域是由國家管理的，我們只能盡力爭取。不過，得到總理今次如此正面的回應，我相信這是一個很正面的會議消息，亦希望這問題會在可見的將來獲得解決。

張超雄議員：特首剛才在回答劉千石議員和單仲偕議員有關貧富懸殊的問題時，引述了很多數字，似乎顯示我們在現時的經濟改善下，民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最近，智經研究中心（“智經”）發表了一份有關香港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報告。智經好像也是特首的朋友，特首認為親疏有別，議員說的話他可能不聽取，但朋友說的話也應該會聽取吧。我們看回智經的研究，它說以每月收入不足 8,000 元的低收入住戶計算，由 1997 年的 20 萬增加至 2005 年的 50 萬，佔住戶數目的比例亦由 13% 升至 22%，而在 1996 年，貧富人士的收入相差十六倍，到了去年則擴大至二十三倍，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低收入住戶的比例上升，也越來越多小孩生活在低收入的單親家庭中，這些均是客觀的數字。

我知道特首已回答這項問題兩次，但這些數字很明顯地顯示，過去的措施未能生效，即使有經濟增長，仍然未能有效幫助減輕貧富懸殊，令貧窮的家庭，尤其是很多弱勢社羣的生活得以改善。我相信除了特首剛才概括性地提及搞好經濟外，也必須提出具體的建議。我希望特首今天能告訴大家，有甚麼具體措施以改善貧富懸殊的情況？

行政長官：今天不是發表施政報告，也不是發表政綱的時候，我相信很難談到具體的問題。如果要談到具體的問題，我相信應該在其他場合談，我現在只能談我的方向和應該如何做。我曾在施政報告中說過，有關具體的方法，大家將來可以在很多場合裏提出來辯論，張議員也可以提出具體的方法，讓大家辯論，看看是否可行。

有關貧富懸殊的問題，並非只在香港發生，全世界所有先進國家均發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且不是那麼容易一朝一夕便能解決的。我只是希望從宏觀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在微觀方面，我們可以逐一處理每宗個案，我相信這是比較實際的方法。

有關智經所進行的調查，我有約略看過，但它所調查的是有關戶籍的收入，跟我們所說的個人收入有少許區別。在戶籍的收入方面，由於現時香港社會在家庭方面出現改變，特別是單親家庭的人數減少了、戶籍多了和人口減少了，此外，老人家從家庭中分了出來，長者家庭的收入亦減少了，所以如果從戶籍來看，那個數字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可是，在個人收入方面卻的確有所改善。

但是，我所說的、我們所說的、你剛才所說的及單仲偕議員剛才所說的，全部均是冷漠的數字，我們要記住，最重要的便是知道有些基層市民是我們要關注的，在這方面，我們一定是逐宗個案、逐項程序來討論有關問題。我們以往一直做了很多工夫，我們以前也有很多舉措，而我們會繼續做，因為這是一個關心每一個市民的社會，我們是不會遺忘這批人的。最重要的不止是單純地幫助他們，而是應怎樣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以及他們將來在社會晉陞的機會。如果今年不是很好，便希望明年會更好，後年會更好，這是我們工作的目標。

張超雄議員：主席，如果沒有具體的政策，我們很難進行具體的討論。我們之中有誰不知道媽媽是女人？有誰不知道我們一定想大家都好？我相信“中國好、香港好”這句話已說了接近 10 年，我希望特首能真真正正拿出一些具體的措施。此外，如果他說民間沒有提及具體措施，我便有相當的異議。以過往民間已提出了在檢討.....

主席：張超雄議員，有很多議員尚在輪候提問，你可否提出你的問題呢？

張超雄議員：是的，明白。讓我簡略地說，民間其實也有很多具體措施，希望政府有所回應，以及拿出他們的具體措施，否則，香港人是沒有盼望的。

行政長官：多謝你的意見。

梁耀忠議員：主席，特首剛才回應下屆參選的問題，與他近期回應新聞傳媒的說法十分一致，他表示目標是一定要做好目前的特首工作。當然，對於市民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特首，儘管你說要做好目前的工作，可惜的是，我們作為市民，卻看到很多問題仍然是未獲解決或改善的，例如藍天行動、文物資源保護，又或是僱主欠薪——最近欠薪的情況不斷惡化，例如成報、名古屋餅店等個案，我今天早上才接獲二十多名房屋署外判員工的欠薪投訴——還有最低工資的問題，或許你說已經有最低工資的保障，我也不計較其成效了，但工時長的問題卻仍然是“交白卷”的，還有內地食物安全等問題，一連串問題是仍然存在的。此外，近來港燈加價等問題，是市民大眾一直所關心和感到不滿的.....

主席：梁議員，請你直接提出你的問題，好嗎？

梁耀忠議員：.....但很可惜，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措施，能夠令這些問題得以改善，或能夠化解市民對政府的怨憤。

我想問問特首，究竟他近期所做的工作，是否真的一如他剛才所說般，是放在香港市民所關心的問題上，還是口說一句，但其實卻正擔心梁家傑議員能夠取得 100 票的“入場券”，而不斷挑戰他公開討論的政綱？他私下會否正如他剛才不斷說般正在鑽營，不止是空話，而是能實行的政綱來跟他辯論，因此無法真正處理我剛才提出的問題呢？我們市民不知道他把“心”放在哪裏，究竟是放在處理問題上，還是放在競選方面呢？

行政長官：梁議員，香港是一個多元化、透明度高的社會，每天也會發生一些事情或產生一些問題，如果一個地方少問題發生，那便不是一個活躍的社會了。我們每天也會發生很多好的事情，但每天亦會有很多困難的問題。你剛才說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還有其他的，如果你早上參加我們的早禱會，便會發覺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是你未有列出的。

其實，我們不單擔心這些問題，希望就這些問題尋找好的解決方法，而你們也在盡力，每個問題均經過討論，每星期也在這個會議廳內經過討論。對於每一個問題，我們的同事亦已作出充分的回應，即說出政府應採取怎樣的措施來處理。當然，那些措施無法令問題在一朝一夕間完全解決，但你所說的每一個問題，我們亦有作出回應。

舉例來說，昨天曾談論很多有關孕婦的問題，或有關文物保護的問題，我們亦已回應說出我們的策略是如何。當然，能否令梁議員感到滿意，我我不敢說，但我可以告訴你，這反映出我們已作出很大努力，而且我們作為政府的，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而尋求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法，並做了我們該做的事。

所以，我相信香港市民。香港政府會繼續努力，我每一天也在為這些事而努力。對於你剛才說的每一項議題，特區政府的同事已經作出充分、實質的回應，並已說出我們的看法。有些問題是不能夠在一朝一夕間得到解決的，因為那並不是我們能力範圍以內的事。有些事情是關於 — 例如食物安全，我們的食物完全是依靠外來入口，今天又有問題發生了 — 是有的，這些問題並非由我們引起，而是別的國家出現問題，對我們造成影響，我們便要作出回應，以好的辦法來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這是我們基本要做的工夫，我們是責無旁貸的。

可是，不要以為有問題出現的地方便是有問題的社會，不是這樣的，一個有問題出現的社會，其實是一個具透明度的社會。得悉問題發生後，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全心全意地解決問題，並提出有效的處理方法，讓市民覺得政府已下了工夫，我便是希望做到這一點。

梁耀忠議員：主席，社會是一定會出現問題的，如果是沒有問題發生的，那便不是一個社會。不過，問題在於當社會出現問題時，便正正考驗政府和領導人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很可惜，我剛才提出的問題並不是我個人是否滿意的問題，而是問題的惡化程度便正如你剛才的引言、你的民望一樣不斷惡化。所以，這並不是我的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很多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但很可惜，政府實施的政策卻是相反的。所以，我想問的是，例如有些員工已經在政府部門工作 10 年之久，但現在臨近年尾，政府竟然說解僱便解僱，不理會他們，讓他們淚眼連連地過年，這做法是否以民為本呢？你的政策、你的“心”是否放在民心關注的問題上呢？你有否關注市民能否安穩生活、所得的工資能否保障基本的生活水平，讓市民能安心、快樂地生活呢？

行政長官：我們作為政府，僱用了 16 萬名員工，另外還有 16 000 名非政府合約僱用的員工，我們有負上僱主的責任，但職位流動的情況是一定會出現的。當職位上有所調動時，一定會出現增聘或解僱的情況，但我們每次也作出負責任的做法。

我相信議員剛才說的，是指現時屬非公務員合約的員工，現時合共有 16 500 名。我們最近完成了深入的檢討，發覺有 4 000 個職位因為有長期的需要，確實應該撥入政府編制內。但是，至於其他一萬多個職位，部分屬季節性工作，並非長期職位；有些是短期工作，員工每星期的工作時數並非 44 小時；有些則是因為某項工程而開設的，所以在工程完結後，聘用合約亦會完結。因此，是一定會有流動率的。

對於遭政府解僱的員工，特別是那些非政府合約的員工，我們會盡一切努力，替他們重新尋找工作，我們是會這樣做的。解僱的工作，我們一定會盡量減至最少。可是，作為大僱主，受納稅人委託管理公帑，我們一定要做足該做的事。不過，特區政府和以往的政府一直希望做到一位有責任的僱主，我相信這是有事實和證據支持的。

對於保障勞工方面，我們已經在另外的場合討論了很多次，推行了很多措施、做了很多大小動作，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努力。對於保障員工的利益，我們一定責無旁貸，是會優先處理的。

詹培忠議員：特首，在去年 11 月 18 日，國家主席在越南會見你時，提出了 4 項要求：第一，下大力氣把香港經濟搞好；第二，改善民生；第三，把社會和諧的局面保持及鞏固；及第四，搞好行政長官委員會的選舉。最近，你向傳媒說現時香港經濟是 20 年來最好的，所以令市民感到很混淆，如果真的如此好，國家主席又為何要求特首下大力氣搞好經濟呢？特首可否藉此機會讓全港市民理解，你們之間有甚麼深層次的矛盾呢？

行政長官：主席，於此方面，我們並沒有深層次的矛盾，他只是回應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要搞好經濟。他很相信我們在很多方面出現的問題——正如剛才所提及的基層市民的生活——例如香港出現一些社會不和諧的情況，都是由於經濟可能有需要維持得更好。他在跟我們談話時，公認、確認了香港現時的經濟基調是相當好的，他認為我們應該維持，不能令經濟滑落，這是我正在努力進行的事。我們雙方並沒有一點兒差距，對於現時香港經濟好的表現，他認為這是確定的，但我們一定要維持下去，不要忽略其重要性，是要繼續維持下去，我相信這對於香港民生是一項重要的元素。

詹培忠議員：特首，但為何國家主席要求你下大力氣呢？如果你所下的力氣已經足夠，覺得你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得已夠好了，他會說：“你做得好。”既然那已經足夠了，為何還要下大力氣呢？如果我理解錯誤，我便真的沒有資格擔任立法會議員了。（眾笑）

行政長官：你有沒有資格擔任立法會議員，由你自己決定吧。很多謝你。（眾笑）

呂明華議員：由於中央政府的支持，國內的企業和民企繼續來港上市，令香港走向成為中國金融中心之路。請問特首有否研究和採取措施，吸引更多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如台灣）的公司來港上市，使香港成為亞洲，最低限度是整個亞洲區的金融中心呢？

行政長官：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而是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是這個時區內的金融中心。

我們的集資能力在 2006 年的表現相當好，全年的集資量超過 3,300 億元，而在世界排名方面，我很相信即使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現時尚未看到倫敦的最後數字，但我們已經超越 New York。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但是，我們一定不會自滿，因為現時我們覺得要看的，不單是要吸引內地企業來港上市，還要吸引台灣或 Cayman 等地區。除了這些地區外，也應吸引其他地區內較具規模的企業來港上市。據我所知，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交易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正在研究這個問題，而它們首先的目標是一些跟香港的管理制度和市場制度非常相像的地方，包括澳洲和加拿大的哥倫比亞省，這些都是它們會逐步進行的。

據我所知，證監會和交易所的下一步計劃，是研究一套更清晰的機制，不是針對地區，而是一般性的條件，明確指出只要不同地區或地方的公司能夠迎合這些條件，也可以來港上市，即無論甚麼地方也可以來港上市。據我理解，這項工作現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很快便會有這方面的公布，而我也會繼續關注這方面的工作，希望呂議員亦同樣關注這方面的工作。

呂明華議員：我想請特首告訴我們，如要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是否要考慮國際化的成分呢？究竟現時香港的國際化成分跟紐約和倫敦相比，差別在哪裏呢？

行政長官：我想，我們的國際化成分跟該兩地已很相像，現時的問題是我們的市場不夠大，因為美國本身的財經力量的確較我們亞洲區大，即使我們與

日本和內地加在一起也不夠它大，歐洲也是一樣。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基建，而在於市場大小的問題。不過，我對這方面很有信心，因為現時內地經濟如此蓬勃，處於擴張的形勢，我很相信在 10 年內，整個亞洲區，不單是中國內地本身，日本、泰國和韓國等地也會增長，整個亞洲時區的總體生產總值的總和可能會追近美洲和歐洲，屆時香港的能量或可發揮的力量自然可以真正與 New York 和倫敦媲美。

黃容根議員：特首，近年由於食物安全問題不斷出現，引起了中港兩地人民的關注，亦令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官員對食物安全和由農場到餐桌的源頭管理有了新的認識，以及加強了溝通和合作。特區政府更應民建聯的要求，在 2005 年成立食物安全中心，但這些問題似乎仍未得以解決。近期，蛋類的蘇丹紅問題和多寶魚的硝基呋喃問題，更引起了兩地政府的重視和市民的關注。所以，特首這次到北京述職亦親自拜訪了有關部委，希望進一步取得內地的保證，在食物安全供應方面做得更好。

1 月 1 日，恢復供港的蛋類已備有衛生證明，也有註冊的漁場，但食物的“水貨”又會怎樣處理呢？政府有甚麼辦法應付呢？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看到，香港現時是欠缺一套完整的食物安全標準。至於食物安全中心的官員，卻並沒有有關漁農業新科技發展的專業知識，未能使源頭監管工作得以事半功倍。我想問特首，有否打算提升和檢討食物安全中心官員的專業水平呢？

行政長官：也許黃議員容許我跟他分享一下我對這方面的政策構想和管治模式，以及將來會如何處理，特別是我們怎樣看待將來的立法模式。

由於現時市民的關注和生活質素的提升，我相信要保障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一定要在食物安全方面付出很大努力，而不能再用以往的思維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完全同意他所說，現時的程序不夠完善。從蛋的問題到魚的問題，今天又有茅台酒的問題，是出現了很多問題。

我的構思是這樣的，我希望所有進口食物的入口商均須接受登記，即經過登記的程序。此外，我們一定要說明對每種主要食物所要求的安全標準，並訂立清楚的規例，同時更要求所有入口商均須備有出口國家的證明書，證明其食物能符合香港本身的安全需要。在內部方面，我們亦會進行更多抽查，進行抽樣驗查的手續，我想這是我們的總體構思。當然，這些工作必須逐步進行，而我們一定要做好本身的標準，雖然這是很花時間的，但仍然要

做，因為入口商的登記是一定要做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執行有關檢驗書的規定，證明進口食物符合香港標準的工作，是必須花些時間跟每一個出口國家，特別是內地方面進行商討，以應付這方面的需要，而且他們的標準一定要跟我們看齊，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我們必須做到能逐步進行這些工作。

我很希望能在這規範內推行我們的政策，並進行立法，然後利用附屬法例或行政手段，逐步令外地配合我們的方法，逐步推行。從蛋、魚以至其他食物，一直逐步進行，我覺得這是我們應採取的做法。關於這個構思，如果各位同事希望再作研究，大家可以再次分享和討論。我這次到北京的質檢總局，便是就這種做法跟他們商討。整體來說，他們的回應是正面的。當然，要求每一件運到香港的出口貨品均須有食物安全證明，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並須花時間進行。因此，我們會主要着手處理普羅大眾食用最多的食物，先行處理這些食物，然後才逐步處理其他，我認為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這是個好方向。

至於我們本身，食物安全中心將來會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登記和質量檢定方面。我們的要求不能太苛刻，因為如果苛刻得別人無法做到的話，我們便沒有東西可吃了。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要檢討現時的要求是否過於苛刻。我們對於某些食物所要求的標準，似乎比日本還要高，但是否有這樣的需要呢？如果我們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長遠的問題也可能會一併解決，這便更好，否則，每天也不斷有問題發生的。現時，國家對於這些問題特別關注，因此，所發現的問題亦會越來越多，在這情況下，我們一定要有完善的策略以作回應，這是我本人的構思。

黃議員，如果我們能進行登記手續，我相信那些非法進口的“水貨”便可以杜絕，因為如果食物不是經由登記商進口的話，即屬於非法進口，這樣便可以將其杜絕。關於追溯來源方面，現時我們特別研究了一種名為“應用射頻識別技術”的方法——它的英文名稱我很清楚知道，但其中文名稱讀來則頗為“論盡”——即是在食物樣板上進行射印，以說明食物的來源。有了這些科技的識別，便能夠追查物件是哪裏的出品和出產，全部都能夠做得到，我希望這樣可以杜絕“水貨”的情況。

關於食物安全中心內的同事的訓練和工作，希望你明白它還是一個新的部門，而當中的同事皆訓練有素，有些更曾在美國的食物安全中心接受長期訓練和交流。我相信他們均具備了基本的技術，所存在的只是資源和時間的問題。只要給他們多點時間，我相信他們會做得更好。

黃容根議員：主席，昨天我跟一些生果進口商前往會見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他們已經考慮到內地自 7 月 1 日起已對生果的管理採取登記措施，但我們的政府卻好像完全不想將它納入其中。如果是這樣的話，無論採用甚麼追縱系統都是沒意思的。我剛才問到，政府在聘用問責官員時，是否要提升有關的水平？當然，特首已說了會提升他們的水平，但我希望可以提升得更快。

行政長官：我剛才也說過登記手續方面，因為如果內地願意進行這些手續的話，我們一定要充分回應，並以好的方法回應，我本身也很希望全面進行登記，只是要多花點時間而已。

周梁淑怡議員：特首在結束述職時，曾經向香港匯報過幾個喜訊，其中之一是我特別歡迎的，便是溫家寶總理已確認和支持香港繼續作為國家的國際會議和展覽中心基地。外交部也表示可以與特區政府密切合作，以爭取和提升我們的地位。請問特首，特區政府打算怎樣爭取所有大型的國際活動在香港舉行呢？特別是怎樣利用全方位或全民網絡來引進這些會議和展覽呢？政府又會如何跟國家合作，特別是會否首先請國家以香港作為舉辦其本身大型會議和展覽的首選地點，以確保我們有強大基礎面對周圍，尤其是我們鄰近地區在這方面不斷增長的競爭呢？

行政長官：我向溫總提出這項建議，是基於我們在近兩年曾舉辦數個大型的國際會議，而且做得相當不錯，世界上的回應和評價也是相當正面的，在這方面便加強了我們的信心。此外，我們對於展覽場地的發展，最近也投入了新的本錢，例如亞洲國際博覽館，即機場的博覽館，正進行第二期的發展工程。在會展方面，也正進行擴大第一和第二期之間的聯絡點，我們一定要充分使用這些新設施。不單是硬件，我們的展覽軟件可能也是世界一流，很多都被公認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有信心向溫總提出建議，他也作出了很正面的回應。

我相信這方面的跟進工夫是各方面的，第一，因為我們要爭取的是國際盛事，一定要與外交部聯繫。我曾跟李肇星部長提出這個問題，他亦很支持，並記錄在案。就在這方面的工作，我會繼續透過香港外交部專員及國家外交部進行，因為他們知道所有的國際展覽。他們在這方面可能可協助我們爭取，在這麼多的項目當中，究竟哪些更適合來港展覽呢？我們便在這方面下工夫。

此外，在省市的層面方面，我們更可以多做一些聯繫的工作，讓我們協助他們，以及表現出我們根本有能量舉辦，這些展覽很可能適合在香港舉行，或協助他們在其他地方舉行。我也會透過港澳辦，希望與北京各部委，包括商業部和舉辦這些國際展覽的部委聯絡，希望他們每一次也能夠考慮香港作為主要的基地。我會跟進這方面的工作，有關的局也會跟進，香港方面亦會繼續跟進。我相信 Tourism Board 一定會跟進這件事，這是一項良好的生意來源。

此外，在硬件方面，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發展途徑，在這方面我不會容許 — 我再說一次，我不會容許 — 這個展覽的“飯碗”被任何人剝奪的。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當然很高興聽到特首代表特區政府作出這麼大的決心，因為這是很重要的。大家也知道，參加會議展覽的人士的消費能力相當高，以往來說，他們花費均較一般旅客為多。我也很高興聽到國家可以盡量以香港為基地，即他們的大型展覽會先來香港，這也能起一個帶頭的作用。但是，我特別想知道的是，政府方面有否盡量利用香港人本身的龐大網絡？旅遊發展局以往曾多次參與爭取這類活動，大型或小型的都有，發覺香港人本身也有跟業界或不同的網絡聯繫，並且均可以發揮很大作用。特首可否在政府方面能夠盡量聯絡所有市民，令即使是私營機構等均能參與這個動作，我相信這能對整個推廣有利，以及接受方面也會好得多。

行政長官：對的，十分正確，這些不能只靠香港政府自己做工夫，亦不能單靠國家幫忙的。我們在爭取時，可能知道會得到國家的協助，例如舉辦電信展，我們先要發掘出來，然後國家支持我們這樣做。我會把這件事的信息帶到商會和主要商人方面，貿易發展局亦可以進行推廣。當我們發覺有機遇，知道在往後的 5 年確實有國際的大型節目，而我們認為有場地適合舉辦時，我們便會盡量配合，以集中火力來爭取。

梁國雄議員：曾特首在這裏談願景，談實踐願景的能力。我聽過一句話，那不是我說的，是英國一位爵士所說的，便是“權力造成腐敗，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這句話說來做甚麼呢？便是不管你有任何良好的願景，只要權力不受監察的話，便是做不出好事的，這便是他所要交代的。

其實，談到願景，我未聽過浮士德會談願景，我覺得你便是浮士德，所以你說願景成真，其實是白說的，因為你根本沒有願景。在我看來，一個人做人沒有願景，便是行屍走肉，做官沒有願景.....

主席：梁議員，請你直接提出你的問題，好嗎？

梁國雄議員：所以，我想請問曾特首，我的同事剛才向你提出了很多問題，但你全部也說具體的不答，你的意思其實是你沒有答案。你剛才在這裏吹噓自己實現願景的能力，其實是沒有的，對嗎？所以，我想請問你一件事情。我的願景是甚麼呢？我已穿在身上讓你看，便是“平反六四、還政於民、全國慶祝”。這便是香港人及國內的人的願景。

在這個立法會內，到了今天，仍有六成半以上的議員是直選的，在直選的議員是代表着 2007 年及 2008 年盡快有普選。我想請問你的願景，你還想不想做一個享有絕對權力的特首？你是否贊成，你有否對北京說，你曾否把這個願景——你心內的願景或浮士德的願景對北京說？因為大家都知道，北京是決定我們有沒有普選的。你有沒有做到？否則，我現在向你指出，你是沒有願景，或你沒有把你的願景變成事實的能力，這便是在 2012 年實行普選。

主席：你是否已提問完畢？

梁國雄議員：還有，在 2012 年之後普選立法會。我再說一次，在這議會內，沒有人談小圈子選舉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是耻辱。今天，我相信有很多我的同事.....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是否已提問完畢？

梁國雄議員：今天，我想是有很多同事在我背後訕笑我，指我亂說，我覺得很榮幸.....

主席：你讓行政長官有機會回答問題吧。

梁國雄議員：是。所以，你有沒有願景？你回答我。你實行願景的能力是甚麼？這個便是 2012 年直選和令官商勾結消失。我的說話很簡單，我說的所有話，也是因為政府的權力不受監察，在內地如是，在香港如是，這是貧富懸殊、官商勾結的癥結。大家在問來問去，正如抓癢一般，是沒有意思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要坐下，行政長官才有機會回答你的問題。

行政長官：正如我剛才說，我每一天也不停有願景，問題是如何把願景化成真，需要有努力和安排，以及還是要努力的，不能單純說出來便可以的。

還有，我完全同意議員剛才所說，便是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absolutely corrupts**，這是事實，是人人知道的事實。幸好我們香港沒有絕對的權力，任何權力在使用時，透明度也會很高，受到傳媒、大眾，特別是受到立法會的監管。我們的《基本法》內已寫得清清楚楚，沒可能有任何一個人，包括特首在內，能夠行使不受監管的權力，是一定會受到監管的。

有關普選這個意願，我是很明白的，我也有很多認同。在這方面，大家已一起在這方面進行工作。我如何能令願景成真呢？那不是單純喊口號的，梁議員，我們要做些事，我已在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做工夫，我努力想令香港市民可以尋求共識，看看這共識如何能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尋求最好的普選方法，以一個大家同意的好方法來進行。

此外，在立法會普選方面，我們如何能得到一個最好的共識呢？最近，在策發會內，我們就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法已有些眉目，大家正在討論，而且已有文件陸續把事情聚焦，但對於立法會普選的方法現時仍然漫無目標，雖然談了數次，但仍是談不攏。

實際上，我最近從報章看到，泛民自己對這方面也不能有共識，所以這事情是困難的。因此，我們在大聲吶喊之前，我希望梁議員也要合作，一起坐下來討論，看看哪一種方法是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如果要達到 2012 年政制有發展這方面，便真正要作出努力。我會負上我的責任，我希望梁議員也負上他的責任。

梁國雄議員：行政長官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是問他上京述職時，即面對北京領導人時，有否把他心中的願景 — 2012 年進行普選 — 告訴北京的領導人？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是要由他們批准的。如果他沒有說，又怎能實行願景呢？他並沒有回答究竟有沒有。如果是沒有，便說沒有好了。一是他沒有這個願景，一是他即使有這個願景卻不敢說出來，對嗎？這麼簡單的事，他也不回答。

行政長官：梁議員，我覺得你剛才問了十多個問題，我只能盡量回答。不過，如果你要我回答某一問題，我告訴你，我跟國家領導人討論的事情，除了可以公布的那些之外，我很可能不應該、也不適合直接說有沒有談過這些問題，有沒有和他們談過例如關於如何解決內地孕婦的問題，我不能告訴你這些。不過，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正如我已向各位交代，我跟他們的討論圍繞着三大問題：香港的政治情況；香港社會現時發展的焦點、聚焦的問題；香港經濟的問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這三大問題。

對於 2012 年普選，我已經說過，我會繼續在這方面努力做事。我有我的願景，你也有願景，但作為行政長官，我要很小心，因為我所代表的不單是我自己，也代表香港的社會。所以我希望能在這方面聽到香港各方面盡了努力後提出的意見，在達成共識之後，我會盡一切方法爭取我們希望得到的東西。

王國興議員：特首，聞說你在任內曾到東涌視察，但你是否知道東涌這個新市鎮是由於城市規劃失衡而在該處造成了貧窮及就業問題？這除了是因為經濟結構轉型而造成之外，還因為這偏遠新市鎮是像孤島般，交通費相當昂貴。不知你是否知道，如果每天由東涌到市區，一個月便需款千多二千元，但低收入者月入大約只有五六千元，這支出佔了他們的入息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但是，扶貧委員會只向失業者提供交通津貼，讓他們找尋工作，而對月入只有五六千元的低收入者卻不肯給予幫助。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曾進行過調查，發現有半數人的生活水平是處於綜援水平，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患抑鬱症的傾向，是高於全港平均 8.3% 的水平。

在這個情況下，我想請問特首，你可否想辦法幫助偏遠新市鎮，例如東涌等地區的低收入者，讓他們可以獲得交通費的援助，或是幫助他們解決交通方面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關於交通費的問題，財政司司長在這方面下了很多苦功。當然，你認為現時的制度有太多限制，但他現時正在考慮如何令這項津貼讓更多人能使用。

不過，在討論東涌的問題時，我希望王議員一定要較深入地研究。我對這件事，即關於東涌的事情也很有興趣。我不是現在才認識東涌，而是從 1969 年開始便認識這個地方，由開始發展到現在，亦曾參與過不同階段的發展，而我現時亦經常到那裏。

我們千萬不要說東涌的情況很差，東涌是一個新市鎮，我們提供的配套的確未足夠，但這情況正陸續有所改善，不論是在康樂方面的調劑，還是在醫療方面的各方補助，這些設施是會陸續隨着市鎮的擴張而發展，我們是會有補救方法的。此外，市鎮內的就業機會亦不差，居民沒有需要離開該區尋找工作，因為區內有一個機場、有昂坪 360，還有其他的設施。如果你看看現在的情況，便會知道區內的就業情況並不是太差。我相信你對於基層階層工人的情況是很清楚瞭解的。

至於有關交通津貼方面，我剛才已經說過，財政司司長正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我們明白到，做法一定要公道，而且要合理才可以。我相信做到合理是一件頗艱難的事情。究竟要把界線劃在哪個位置呢？我們要記住，我們是運用公帑來辦這件事的，我希望能夠尋找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王國興議員：主席，特首沒有回應我的問題。雖然他剛才說正在尋求方法幫助居民，但我剛才已經指出，這方法未能幫助這些新市鎮內的低收入者，例如東涌的居民。我很多謝特首的關注，我也做了一項調查和分析，我稍後便會寄一份給特首你來進行研究。

行政長官：好的。

王國興議員：但是，特首還未回答我的問題是，對於那些月入只有五六千元的低收入者，如果他們每月須把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薪金花在交通費上，那麼你如何鼓勵他們出外尋找工作呢？至於機場的工作，他們又做不來。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經說過，財政司司長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對嗎？我剛才不作具體回答，便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具體辯論在這場館內已屢次舉行，現在

沒有需要由我來重談這事。我希望從另一個層次，另一個角度，把問題說得更清晰，特別是香港特區政府內的解決方法、長遠而言的方向性等，我認為這樣對於這答問會更有用。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首先想糾正特首剛才所說的一句話，他說民主派在政制問題上沒有共識。其實，這點並不正確。

行政長官：是嗎？（眾笑）

何俊仁議員：因為我們很清楚，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實施雙普選制便是我們的共識。如果因為時間問題而不能實施，不遲於 2012 年是我們的共識。至於具體政制的安排，即使在細節上有不同的建議也好，我們是會互相包容的。主席，我知道如果我再問政制問題，特首又會重提策發會，我也不想在這些問題上糾纏，我只想提出一點，我想問一個很具體的個案、一個非常簡短的問題，便是程翔案件在定罪及所謂判詞被間接公開後，社會上，包括國際上，也有很強烈的回應，立法會亦曾舉行一項議案辯論，很多議員質疑判決的理據是否成立，但我知道再質疑這方面可能也沒多大意思。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所得出的共識，便是希望程翔能早日獲准保外就醫，因為他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我想問特首，他一定知道我們的共同意願，但他曾做過甚麼工作呢？在最近回去述職時，他有否拿出心來提出這件事，來幫助一下香港人最關心的程翔，使他能盡早出獄？

行政長官：有一點，你也可能說錯了我剛才所說的話，我想說的是，你們關於時間表方面的意向是十分清楚的，但問題是，我所說的未有共識，是關乎內涵方面、怎樣舉行普選的問題。但是，我所說的，均是根據報章的報道，如果我看錯了，便對不起了，我真的看到報章是這樣報道的。如果泛民主派關於普選模式已達成共識，我便很想知道是甚麼，或許在會後請你告訴我，好嗎？現時，就怎樣普選行政長官或立法會方面，我正在策發會不斷努力，如果泛民主派就這方面有了共識，我覺得這是一個進步。

對於關心程翔這件事，第一，程翔已經在內地以內地的司法制度判案，我們不適宜在此多談，但我只想說一點，便是凡有機會，我均會提出這個問題，均會為他家人認為程翔所需的東西出力，如果是合理的話，我會盡量、盡量做工夫，每一次有機會在適當的場合中，我均已做了工夫，我會繼續這樣做。

何俊仁議員：主席，有關政制方案，我只想再說一點，便是在大原則上我們已經同意了，在細節上，我們會互相包涵，但如果你認為共識是重要的，我會盡快向你提供一個共識，但你是否覺得有用呢？

主席：何俊仁議員，你剛才的問題跟這件事無關。如果你想跟特首辯論，你們最好私下商議了。

何俊仁議員：如果是這樣，我說回程翔的問題好了。特首仍然沒有回答我，自從立法會的議案辯論得出清楚的結論後，即希望程翔能保外就醫，他有否具體代表我們提出這項要求？我相信他一言九鼎，較我們多人提出的會更有力，國家領導人也很關注他能否代表香港人說出這個心聲，我相信他會做到一些工作。很多具體方案他今天說不出來，但這件事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可否真的拿出心來，多出一點力，幫助程翔能早日出獄呢？

行政長官：我能說的只是，在這問題上，公開辯論未必對事件更有好處。我剛才說，在每次見到中央領導人時，我也曾提出這問題來討論，我相信我上一次到北京述職的時間並不是很久之前的事，而立法會是何時進行這項議案辯論的呢？你看看時間便會知道在辯論後我有否向中央提出這問題，其實，我根本已經回答了你。

梁家傑議員：特首先生，在過去數星期，香港人看到政府就着保育歷史文化的政策有如坐過山車，由閣下很強悍無情地下令把天星碼頭的鐘樓在 1 天之內拆掉，接着把它毀屍滅跡，直到柔情似水的“香港家書”，以至何局長在星期一提出的諮詢（那是一個我們由 2004 年等待至今，仍須多等 6 個月的諮詢），當中好像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我想問特首，其實，這個變化是基於甚麼理由呢？會否是你已完全改變了這種家長式的精英治港心態，真的要吸納民間智慧，好讓市民可參與規劃？還是你只是抱着回應你心目中看來是刁民的、井底之蛙的意見（真的可能是為了招安）的一種態度呢？

主席，我想問特首，如果是前者，為何我們在何局長的公布中看不到有這種心態上的轉變？如果是後者，究竟是否口惠而實不至呢？會否是他未能回應市民追求本土文化的認同和身份這種訴求上的改變呢？有一名街坊跟我說，特首究竟是否在“耍”我們呢？

行政長官：好的。首先，很佩服梁議員提出的那些諷刺的語言，我要多多學習。大家可以找個機會再作辯論。

首先，對於天星碼頭事件，不單對於我，我相信對於梁議員，對於全個議會，也覺得是突如其來的，香港人是突然醒覺起來，這個新局面是我們看得到的。撇開天星碼頭不談，因為那時候工程已在進展中，沒有迴旋的餘地了，但在整個保護文物的政策上，我們真的要從心裏謙虛地看這問題，這方面我是相信的，而我的同事也相信的。

我們現時有沒有保護文物的政策？我們是有的，何局長已向大家解釋，我們是有這項政策的。政策也有一些規範，那些規範說明我們現時要用甚麼規範、用甚麼標準來釐定哪些建築物須予保存、哪些文物須予保存；也說出在這些規範之下，我們作出了一份清單，大約有四百九十多件文物，是我們準備保護的，這些是以往已做的。不過，我覺得現時的環境已改變了，即是梁議員剛才所說，香港人對本地的認同、對本地的歷史存有的情懷——即現時所說的集體回憶——更須尊重。那麼，應如何處理呢？何局長已清楚解釋我們的方法，便是我們希望全盤再拿出來讓大家一起看。有關我們現時的政策，我們的政策表明保護文物並不是說政府要接管這些文物；保護文物不應單純從建築本身的價值來看，也不應單看其歷史的長短。保護文物須與它的經濟代價取得平衡，要充分照顧私人業權。這些問題是根據我們現有的政策做出來的，但我們可以拿出來再討論，我們會舉行數場公開辯論，大家可以拿出來再討論。如果認為這些仍不足夠的話，也可以想想如何才足夠。

我們在這項政策之下，選出了四百九十多個認為應受保護的建築物，如果認為不準確的話，例如應要增加或縮減，可以拿出來再討論，我們願意繼續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要深入討論這些問題。

但是，將來的保育方法是怎樣的呢？應該由納稅人承擔，還是以其他社會方法來承擔呢？如何承擔責任呢？我們是否要充分照顧那些業主的業權呢？如果要照顧個人業權，會否影響利益輸送這問題呢？這些問題全部須經由社會討論，一定要看清楚這些問題。提出了這些問題後，我們便會找尋答案。我完全願意再釐定政策，跟大家一起分享和討論此事，把這項政策界定得清清楚楚。在未能就這情況作決定之前，如果有個別事情須解決的話，便就個別事情進行處理好了。我們可逐一根據不同情況，從公眾利益來看，做我們應該做的事，對每一件事情，我們也有需要這樣做。我認為這是一項很大的政策問題，我歡迎重新檢討這問題。

然而，我一定要找出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大家接受的政策、大家接受的保護文物清單，因為這影響到我們將來全期的發展。如果是政府的建築物，便會影響我們將來的發展潛質。如果是私人物業，則會影響私人業權

方面，如何保障他們在憲制和法律上其本身的權利呢？這些皆是我們須作研究的。但是，我已經說過，這些問題是可以全面拿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和研究的。

梁家傑議員：主席，這樣的話，我可以很放心地跟那位街坊說，特首並不是“耍”我們。但是，在跟他說出這個答案之前，我還想澄清一件事情。特首可能記得，政府在 2004 年曾發出一份諮詢文件，當時發出文件的時候，政府曾承諾會在當年年底發出第二期諮詢文件，以作出建議。但是，我們現已等了兩年多，還要多等 6 個月。如果特首想我跟這街坊說，特首並不是“耍”他的，那麼，為何在過去兩年多以來，政府還沒有根據 2004 年的文件作出建議呢？

行政長官：他們是有做到的。我剛才所說的清單，以及他們所做的事情，也是在這段時期制訂和做出來的。但是，現時這些均已沒有用的了，梁議員，因為香港人現在所需要的，是他們表達了不滿意這些安排，他們要多些考慮，多些新的元素，要包括集體回憶在內。我們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要我們拿出來再諮詢，我們現時的諮詢方法，一定要涉獵各方面的意見，要把這項政策從根本重新建設起來。我很希望新的政策、新的安排能吸納每一名市民的意見。這樣才能在這方面尋求一個新的共識，使我們現時所作出的定位，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那數個標準般，能作出更好的調校、能訂立一個比較公認的、大家可以接納的政策。

但是，我要再指出一點，便是即使我們有一項很好的政策、社會也公認是很好的政策，但對於某個建築物須予保留，或某些建築物不應保留，也未必能夠得到所有人共同的認同的。在外國，很多人已有此經驗，便是當社會已取得共識，認為某個建築物須予拆卸，但到拆卸時，仍會有人把自己鎖在建築物內跟當局鬥爭的。這些是公開社會的必然現象。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便是即使我們有了決策、有了共識、有了清單、有了發展計劃，仍不可以要求社會上全部人也認同此事的，正如大家可從今次天星碼頭事件中看得到。我很尊重年青人的熱情，他們說沒有人可代表他們，他們要自行說出自己的心聲，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耐性，聆聽他們的聲音。不過，我們作出決定之後，在執行時也並不會因此而減少執行上的困難。我覺得這是我們將來須面對的事實。

但是，就政策方面，我可以讓大家一起公開討論的，好嗎？

主席：多謝行政長官共回答了 15 位議員的問題。有 24 位議員輪候想提問，希望曾輪候但未有機會提問的那 9 位議員，下一次有機會提問吧。

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議員站立。

行政長官：多謝各位。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31 分休會。